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11

王鴻仁譯

一九二〇年（補）

（挪威）珂努忒·哈姆生

（Knut Hamsun）

一九二〇年，瑞典學院毫不猶豫地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挪威的哈姆生。主掌此事的諾貝爾委員會們都相信，此一抉擇必能博得世人一致的喝采——至少在北歐諸國當可如此。後來事實證明：哈姆生的確是一名頗孚衆望的得獎人。

在此之前，瑞典和丹麥已經各有兩名文學獎得主了。挪威雖然僅有一位作家獲得此項殊榮，可是那位得獎人的條件却是無比優越——班生是一個國際性的詩人，畢生戮力於各種文學體裁的創作，而且均有非凡的成就。班生於一九〇三年獲獎，那時候挪威和瑞

典在政治上渾然一體，接受同一國王的統治。挪威於一九〇五年獨立，翌年易卜生去世。從那時候起瑞典學院就不曾鄭重考慮過任何一位挪威作家了。瑞典學院這種態度令挪威人大為不滿。這也難怪，因為易卜生和班生的接棒人裏頭確實有不少才氣縱橫的後起之秀。

一九二〇年，參加角逐的作家共有十五位，其中三位是挪威人：哈姆生、嘉堡（Arne Garborg）和金克（Hans E. Kinck），三位都相當突出。金

克和嘉堡以前曾被推薦過好幾次，瑞典學院也曾延請專家撰寫關於他們的研究報告。哈姆生以前只被提名過一次，那是一九一八年的事——該年的文學獎並未頒發。一九二〇年提名快截止時。他的老友卡爾菲爾特（Erik Axel Karlfeldt）出面推薦他。卡氏當時在學院裏頭擔任常任秘書之職，他本人也於一年之前被提名，不過他拒絕了。爲哈姆生奔走最力者當然是卡爾菲爾特，不過另外還有兩位院士也非常熱心：英格斯陶穆（Albert Engström）和奧斯特林，兩人對那位「飄泊的挪威天才」極爲欣賞。

雖然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霍爾斯陶穆提出了一份對哈姆生頗爲不利的研究報告，不過卡爾菲爾特還是說服了委員會的委員們，而且沒費多少口舌。

霍爾斯陶穆的正式報告書却很誇讚哈姆生，特別是談論他早期小說的部份。哈姆生的早期小說包括「饑餓」、「牧羊神」、「神秘」、「維多利亞」等。這些書雖然深受舊俄文學大師的影響——特別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不過還是可以看出它們都是非同凡響之作。他那些詩體的哲理劇本就沒那麼引人入勝了。

霍爾斯陶穆認爲它們有點像是「皮爾·金特」（Peer Gynt）與「西拉諾·德·別吉拉克」的混合體，十分鬆散，蘊義不易捕捉。霍氏的報告極推崇哈姆生的近作，「土地的生長」（Growth of the Soil）：這本書格調極高，構思清新無比。霍爾斯陶穆的結論是：如果僅就藝術才華而論，沒有任何一位挪威作家能與哈姆生相提並論。他的心智雖然有點飄忽不定，可是却異常細膩。從根本上說來，他代表着一股噴湧、騷亂的力量，絕非故諾貝爾先生所屬意的那種「熱切追求理想」的人。基於這個原因，瑞典學院特別強調：哈姆生之所以獲獎乃是「由於他的力作，『土地的生長』。」

在德國及斯拉夫國家裏頭，哈姆生的作品不論原文本或翻譯本均擁有廣大的讀者。因此哈姆生的獲獎不僅僅是北歐文壇的盛事。德國人和斯拉夫人大致擁護瑞典學院的抉擇，有些反應甚至非常熱烈。Dagens Nyheter 這家瑞典大報對於學院決定經常總是不假辭色，而這次却如此評論哈姆生獲獎的事：「他是挪威文學宗師們的嫡嗣，足與易卜生及班生分

庭抗禮。」

德國輿論界也熱烈支持，而且有其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哈姆生是一個惡名昭彰的親德份子。他之所以有這種態度乃是由於他曲解了尼采的種族主義。所幸他的種族偏見並沒有出現在他的書中。這種狂熱擁護「金髮動物」(die blonde Bestie)的態度後來竟驅使他神智散亂，幾乎瘋狂。

法國人對於哈姆生獲獎的消息反應相當冷淡。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的名字不很響亮——雖然到一九二〇年為止，他的作品已經被譯成將近二十國的文字。他有幾本早期的小說曾經出現過法文譯本。不過他在法國始終不是一個衆所周知的人物。

俄國的情形就不同了。遠在十月革命之前，他的作品就已經被介紹到俄國。他的書在俄國青年知識份子之間流傳極廣，影響之鉅簡直可與高爾基(M. Gorki)相比。

英國和北美對哈姆生不很熟悉，那兒的大報僅僅提起哈姆生獲獎的消息而未加以冗長的評論。哈姆生在開始寫作之前曾去過美國。那是一段流浪飄泊的艱

苦歲月。後來他曾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以激烈而且極具說服力的筆調批評「美國的生活方式」。現在美國輿論界的緘默正好印證了當初他對美國文化所下的按語。

獲獎那年，哈姆生剛好六十歲。這位孤僻得有點傳奇性的人物親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他雖然一直避免和報界接觸，可是他還是很快地成為當時的風頭人物。他拒絕代表所有的得獎人在頒獎典禮後舉行的宴會中發表答謝演講——這項差事通常總是落到文學獎得主的身上。不過，令大家感到驚訝的是，他竟然站起來，舉杯祝福全世界的兒童。他這樣做主要是要報答斯德哥爾摩的學童們對他的敬意。宴會結束後，他的心情非常好，因此當他回到得獎人下榻的大酒店時，竟堅持要和他的瑞典朋友卡爾菲爾特及英格斯陶穆平分那筆獎金。他們婉拒了。他非常惱怒，竟決定要把那張支票和獎狀送給爲他服務的那位僕歐，可是他却把支票和獎狀搞丟了，直到第二天人們才在電梯裏找到。

一九二五年

(愛爾蘭) 喬治·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一九二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並非在一九二五年頒發的。它被延了一年，於一九二六年和該年的獎金同時頒發。一九二六年的五項諾貝爾獎當中，最引人注意的已不再是文學獎，而是和平獎了。在停頒兩年之後，挪威國會連續將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的和平獎頒給了四位國際知名的政治家——二五年：英國的張伯倫(註)和美國的道斯(Charles Gates Daves)，二六年：法國的白理安(Arside Briand)和德國的史特萊斯曼(Gustav Stresemann)。不過，二五年的文學獎最後也終於受到世人的重視，因為這年的文學獎在諾貝爾頒獎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

當瑞典學院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決定

(註) Sir Austen Chamberlain 訂慕尼黑協定的那位張伯倫便是這位張伯倫的弟弟。

要將一九二五年的文學獎頒給蕭伯納時，學院秘書慣例立即去電通知得獎人。消息傳出之後不久，路透社發佈了一篇異常精簡，然而真實性却十分可疑的新聞稿。這篇稿子裏頭「引述」蕭伯納告訴記者的一句話：「這件事情我實在想不通。我想我之所以獲獎是由於今年我什麼都沒寫」。接着下來，一連好幾天世界各地的報紙都以頭條的地位報導各式各樣的謠言，如「蕭伯納拒絕接受諾貝爾獎」「蕭伯納拒絕領獎的消息震驚全球」等等。「他們幹麼要在出了名的老頭子頸上繫一個金鈴子？」蕭伯納問道。

這位愛爾蘭的幽默大師拒絕參加這種無聊事。他的反應任誰都忍不住要喝采。蕭伯納終身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榮譽。不管是誰要頒贈榮譽學位、爵位，或榮銜給他，他都認為那會損害他的人格。從這一觀點看去，諾貝爾獎本身也是一種令人難堪的侮辱。

在諾貝爾角逐場上蕭伯納是一羣老兵當中的一個，他的名字一再被提出，他的作品也曾經被考慮，被揚棄，然後再度被考慮。話說回來，他出生於一八五六年，因此有充裕的時間「在他的作品受瑞典學院及諾貝爾委員會注意之前」成爲一個世界文壇的要角。

蕭伯納是一九一一年的候選人之一。他的推薦者爲皇家人文藝協會學術委員會的會員之一，牛津大學的墨累伊教授。當時負責撰寫研究報告的是卡爾菲爾特。卡氏本人不僅是一個偉大的鄉村詩人，同時也是一個優秀的英國文學批評家。卡氏的報告書對蕭伯納極爲有利。然而當時的瑞典學院仍然爲常任秘書艾孚·威爾生博士所控制；對他而言，蕭伯納這個作家是以「過份好詭辯、過份無情、過份不文雅」出名的。結果獎金落入梅特林克之手。

漫長的烽火歲月接踵而至。這段期間蕭伯納是一個激烈的綏靖主義者，他的聲名搖搖欲墜。「碎心之屋」出版了，却始終沒有上演。「回到麥修撒拉身邊」則被認爲是一部乏味的怪誕作品，一無可取。不過，一九二四年，「聖女貞德」問市了，而且獲得空前的成功，使蕭伯納頓時聲名大振。「多穆赫米的牧羊女

」（譯註：即「聖女貞德」）演出極爲叫座，在世界各地創造「一些熠熠紅星：倫敦的西貝爾（Sybil Thorndike）、柏林的伊麗莎白（Elizabeth Bernier）、巴黎的盧蜜拉（Ludmilla Pitoëff）。現在又有一個天才人物在講一種國際語言，全世界都在側耳傾聽。這件事實迅速地傳到了斯德哥爾摩。

一九二一年，一羣瑞典人提名蕭伯納，不過沒有奏功。諾貝爾委員會的專家霍爾斯陶穆撰寫研究報告，他的意見極有影響力：他把蕭伯納約列爲第三選擇，前兩位是H·G·威爾斯與高爾斯華綏。一九二四年，蕭伯納再度參加角逐，這次他的推薦人是一位新近被選入瑞典學院，以前主持國家劇院多年的新院士。在次年的討論中，影響力極大的厄普沙拉大主教梭德布洛穆（Nathan Söderblom）也改變方向轉而支持蕭伯納。梭氏充分發揮傳教士的口才，呼籲大眾注意「奧列昂的少女」（譯註：指聖女貞德）這部作品的戲劇造詣。那齣戲曾在斯德哥爾摩演出。它那種純文學性的特質終於迫使霍爾斯陶穆屈服。霍氏的改變只要聽一聽他在頒獎典禮上所發表的致辭便可瞭然。在那席話裏頭他對蕭伯納的稱呼十分恭敬，往昔的保留態

度已轉變成洋溢的讚美。(蕭伯納沒參加頒獎典禮。)

英國對諾貝爾獎極感興趣。當然，這種興趣完全是被蕭伯納激起來的。沒有任何一位作家像他那樣熱心求名。他很喜欢製造新聞。他經常上報——有時是文字，有時是照片，可是他這樣做主要是爲了要一般人瞭解他的主張。

當蕭伯納最後終於同意接受諾貝爾獎之時，輿論界對這位「老叛徒」毫不留情。諾貝爾獎畢竟不僅是象徵性的桂冠而已，伴它而來的是一大筆金光閃閃的現款。大家都知道蕭伯納對金錢有一種非常古怪的恐懼感——這種怪症在他獲獎時立刻復發了。他和托爾斯泰不同的一點是，他討厭的並非金錢本身。恰好相反，他視金錢爲化解貧窮的特效藥。在他眼中，貧窮乃是現代社會的疫癘，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罪、萬惡之源。

由於收入逐年增加，蕭伯納手頭已經比較寬裕，毋需顧慮那些他認爲是「資本主義加諸他身上」的頭痛問題。不過在他眼中，對他的天才最具危險性的乃是稅吏的存在。就這點言之，他頑固到誇張的程度。他的女秘書布朗茜(Bianche Patch)，在她的回

憶錄上描寫這個現象：蕭伯納晚年經常「週期性」地擔憂他的鉅額收入。他堅信他的收入愈高，則必須繳納的稅也就愈多。他堅持說，他的資產必然會在數年內變成赤字。如果他賺一百鎊，他的稅將會高達一百四十七鎊。任何邏輯和統計數字都不能使他的腦筋轉過來。「我說一百四十七鎊就是一百四十七鎊，因爲這個數字最好記。」

這種複雜的心理足以解釋他接到瑞典學院的電報時他的反應爲什麼會那麼激烈，他的想法爲什麼會那麼固執。這種心理也可以解釋爲什麼接下來那幾天的報紙盡是一些雞零狗碎的消息——因爲記者們到處都找不到他。原則上，蕭伯納厭惡公開的榮譽，同時他也覺得那張金額六千五百英鎊的支票對他而言非常燙手。他家的地窖裏面有一顆炸彈也不會使他憂慮到這種地步。

瑞典駐倫敦公使一連好幾天坐立不安。他竭盡所能避免爆出醜聞。不過羅夫人的機智終於爲他解了圍。羅夫人婚前的名字叫艾芭·畢斯陶穆(Lady Low, née Ebba Bystöm)，她是蕭伯納的好友，曾將這位英國戲劇家的作品翻譯成瑞典文。她曾告訴筆者她

如何被迫鼓起如簧之舌極力說服這位得獎人「不可將諾貝爾獎像小石子般地丟進波羅地海裏」：「我親愛的伯納，這樣做是不行的。瑞典想要褒揚你，可是你却以侮辱來回報他們。」這些明智的建議者終於說得蕭伯納心同意轉，決定領獎，可是不領那筆錢。他決定用那筆錢設立一個英、瑞文化基金會。這項安排似乎使各種不同想法的人都感到非常滿意。每個人都很高興。

在學院的眼中，蕭伯納實際上是已經領了那筆錢，因為他必須先領那筆錢，然後才能隨心所欲地支配它們。一九〇四年的米斯特拉爾做過類似的決定——猶如一九一〇年的海才及一九一五年的羅曼·羅蘭。結果，那筆獎金變成一個正式機構——英瑞文學基金會的基金。該會設於倫敦，有一個總部，一個法人組織，以及一個信託董事會。在戰後瞬息萬變的經濟蕭

條聲中，它始終屹立未倒，而且逐漸發展成一個極有效率的工具——使人們體會到創辦人的寬大胸懷。由於蕭氏這個機構的努力，瑞典的報紙已不像以前一樣，大部份被拿去包澳洲蘋果。它更促使若干史特林堡的重要作品在英國出現譯本。後來它曾實際獎掖過一些瑞典作家，提供他們發表作品的園地，使他們以那兒為根據地，向國際文壇進軍。

當這位毫不反悔的文壇長老看到這筆得來如此奇特的獎金發揮了這麼大的功用時，他感到某種程度的滿意。當他最後終於歸隱到他在艾斯納特·聖勞倫斯的鄉間別墅時，他的訪客們可以看到他那張用像框框着的諾貝爾獎狀掛在一個角落。那是一張著名的獎狀，上面寫着瑞典學院頒獎給這位艾斯納特·聖勞倫斯的大師乃是「由於他那些充滿理想主義及人性的作品——它們那種激勵性的諷刺常蘊涵着一種高度的詩意美。」

一九二六年

(義大利) 葛萊西雅·德蕾達
(Grazia Deledda)

一九二六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被擱置了一段時間，等到翌年才頒給薩丁尼亞的小說家德蕾達。德蕾達是第二位獲得這項殊榮的義大利作家。第一位是遠在二十年前獲獎的卡度齊——義國統一以後的「詩壇第一人」。德蕾達同時也是第二位獲獎的女性作家。第一位是一九〇九年的拉格洛夫。

德蕾達遠在一九一三年便已經被提名，當時她才四十一歲。她的推薦者主要是一羣作家和科學家——都是義國某一所文藝科學院的院士。該學院的創立日期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末克麗斯汀娜女王的秘密會議。這些人後來又推薦過她好幾次，而且有瑞典駐義公使畢爾特在背後大力支持。畢氏本人也是一個大牌作家，同時又是瑞典學院的院士。瑞典的得獎人拉格洛夫雖然心裏比較希望偉大的挪威女作家溫狄西能獲獎，不過她還是不遺餘力地支持德蕾達。雖然瑞典和義大利雙方這樣通力合作，可是却始終無法奏功。一九二七年，諾貝爾基金會的會長，年高德劭的修克教授也出面支持德蕾達，這時，時機才終於成熟。

角逐一九二六年文學獎的新候選人裏頭有當時法國作家協會的會長艾斯陶涅（Edouard Estaunie

），以及在瑞典十分風靡的美國女小說家，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和往常一樣，德國和北歐的候選人佔多數，不過德蕾達確實很幸運：那年湯瑪斯曼和溫狄西的推薦者都沒來得及在限期內提出符合規定的推薦書。這兩位作家都是強勁的對手，分別於幾年之後獲獎。

不過對德蕾達威脅最大的却是三位她的同胞。因為至少有三位義大利作家和她一同角逐諾貝爾獎，而且都很受瑞典學院的重視。第一位是年逾七旬的艾妲·聶格里（Ada Negri），她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及激烈的詩人，雖然已經年逾古稀，可是她那種那布勒斯人的激情卻絲毫沒有消褪。不幸，有些流言說她是墨索里尼最中意的得獎人。這個因素必然會迫使瑞典學院的院士們裹足不前：他們不太希望被捲入和得獎人的藝術造詣毫無關聯的爭論裏。義大利的第二位候選人是名詩人帕斯卡瑞拉（Cesare Pascarella）。帕氏用羅馬方言寫詩，歌詠特拉斯提維耶（Trastevere）以及其他的羅馬名勝。他同時還描繪「永恆的羅馬城」的壯采，用那種取諸平凡人之日常語言而猶保存原有風味的詩意文字抒發他的胸懷。德高

望重的卡度齊曾經稱讚過他（他說：「帕斯卡瑞拉將通俗詩提昇到史詩的最高境界。」）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海才，將他的詩譯成德文。更重要的是，他的推薦人是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克羅齊是義國最有影響力的批評家，他本人也曾被提名諾貝爾獎。

第三位足以和德蕾達爭衡的義大利候選人為費瑞洛（Guglielmo Ferrero），他的史學著作，「羅馬之極盛與衰微」之第六卷，亦即最後一卷，剛剛完成，評論家們都認為這部史乘足可比美德國大歷史家蒙森之「羅馬史」——蒙森為最早期的諾貝爾得獎人之一：一九〇二年。

一九二七年

（法國）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

一九二八年，瑞典學院同時頒發兩屆的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二六年沒頒獎。一九二七年頒的是一九二

瑞典及世界各地對德蕾達獲獎的消息都不甚熱烈。可是義大利國內却熱鬧非凡，義大利人將這項個人的殊榮歸功於 Duce（義文：領袖，即墨索里尼）「開明統治下的文學勃興」。德蕾達一直和政治保持相當的距離：一九〇〇年她嫁給一位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後就離開故鄉薩丁尼亞，定居羅馬。她對法西斯政府從未有過什麼熱烈的表示；不過，她還是和絕大多數的同胞一樣，對於任何政權都安之若素，毫無不滿之情。

德蕾達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不過沒有發表任何正式的答謝演講。

六年的獎。

雖然被提名的候選人有三十六位之多，不過乍看

之下，選擇一位得獎人似乎不太困難。因為那麼多的候選人當中只有三四位候選人條件特別優越，頒獎給他們可以提高此項鉅獎的身價。因此一九二七年的獎幾乎沒經過討論就頒給了由一大羣法國學者及作家推薦出來的偉大哲學家柏格森；一九二八年的文學獎則歸挪威的女小說家溫狄茜。當時溫狄茜的聲望在北歐諸國真可謂如日中天，而且她作品也已經被譯成好幾國的文字。

一年前，湯瑪斯曼出版了他的「魔山」，一部企圖全面探討整個現代世界的鉅著，不過湯瑪斯曼還得等到一九二九年才能獲獎。俄國的高爾基被視為是一個「必勝」的候選人，可是却再度慘遭滑鐵盧。遭到相同命運的候選人包括幾位法國作家，如布爾傑、馬修·底·諾艾爾伯爵夫人（Countess Mathieu de Noailles）、艾斯陶涅，以及老何思尼（J. H. Rosny, Sr.）等等。

柏格森於一九一二年首度為英國的安德魯·朗所推薦——朗教授為皇家文藝協會的會員之一。此時，柏格森一生的工作實際上已全部完成，而且已經是一

個舉世聞名的人物了。

瑞典學院的諾貝爾委員會在審理柏格森時曾委託兩位北歐哲學家——赫林（Axel Hérilin）及諾爾斯陶穆（Vitalis Norström）——撰寫一份詳盡的研究報告。諾爾斯陶穆為瑞典學院的院士，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他又寫了兩份報告書。要不是大戰爆發，連續擾亂了好幾年的頒獎決定，柏格森很可能在那段時間獲獎。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二一年，另一位院士亦即一九一六年的得獎人海登斯坦——以前面那兩位學者的報告書為藍本撰寫了兩份新的研究報告。一九二一年在柏格森的推薦函上簽名的是巴黎「道德與政治科學學院」的十二名院士。該學院的主腦人物為法國前總理希波（Alexandre Ribot）及共和政府前總統笛夏內爾（Paul Desclanel）。然而他們的行動卻沒有收效。那年法朗士擊敗了他這位出色的同胞，取走了獎金。從那時候起他一直沒有被提名，直到一九二八年。然而一九二八年他的條件是如此的優越，瑞典學院除了讓步之外別無選擇。

不幸的是，柏格森身罹重病，已經有很多年無法

走動了。他的雙腳業已癱瘓，有時候甚至連手都無法動彈。他無法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那年對法國而言是非常光榮的一年，因為另一位偉大的法國人尼科爾醫師（Dr. Charles Nicolle）——使肆虐於北非的傷寒熱為之斂迹的人物——獲得了一九二八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尼科爾大夫也無法前往瑞典領獎，因為他必須主持一個即將在開羅召開的細菌學會議。法國駐瑞典公使伯納德（Armand Bernard）代表兩位同胞參加典禮。稍後，在典禮後的傳統性宴會中，他朗讀兩位得獎人的來函。

這些高貴的字句幾乎立即在巴黎再度響起。列維·柏胡爾教授（Lévy-Bruhl）在馬薩欣宮主持道德與政治科學學院年會。會中柏胡爾教授發表了一篇演講，讚揚他那位著名的同事柏格森，以及負責頒獎的瑞典學院：

他這項來自北方的殊榮由於舉世一致之讚揚而顯得更為光榮。儘管他的對手是如此強勁，可是當瑞典學院頒獎給柏格森時，人們實在不當驚訝。學院頒發文學獎給他時，主要確實是要以之褒獎一位哲學家，一位富原創性而且極具深度的

天才。柏氏的鉅大影響力業已傳播到整個世界，而且此一影響業已使整個時代都烙上了它的標記。柏格森的哲學或許遭遇過過挑釁，或許它曾遭到反對——任何一種得勢新理論都難免如此。然而到目前為止，它的文學價值卻從來沒有人置疑過。研究他作品的批評家們無不極力推崇它們所特有的縝密、希臘式的典雅以及完美無瑕的文體——此種文體彷彿可以輕而易舉地解釋一切無法解說的东西。

葉歸何處

簡宛著

四版出書！

每冊30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